

论朱熹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

张新国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朱熹; 传统主义; 经典; 哲学诠释学

【摘要】 在朱熹哲学中,对于经典的诠释,传统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理性的保存。这种保存并非机械地复述,而是对其批判性地改造和延展,进而从经典的精神内核中剥离出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透视置身其中的文化走向,最终时代性地完成思想史意义生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1)01-0103-04

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时期,已经清晰显示出体系化的理论范型。这缘于儒学无论在义理内容和概念形式上都自觉吸收其他学说的思想营养。但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孔子“仁”学的哲学诠释作为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统摄每一个时代性儒学的理性演绎和价值诉求的向度从未间断。与西方哲学通过背叛传统的形式来剥夺传统的精神遗产不同,朱熹以一种传统主义的方法继承传统当中具有持久价值的理念,这一工作是通过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得以完成的,这与孔子的“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在思想旨意上一脉相承,即持守知性理性和价值信仰的双重维度。

一、作为经典诠释方法的传统主义概念解析

在解释朱熹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之前,对“诠释”一词的特定意义作一个前提性的澄清是有必要的:文中此“诠释”一词均是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意义上被使用的。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完成了从“技术学”^[1]到本体化了的人的存在体验这一创造性转换,是对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的内在性的超越。正是在这一思想史意义内在生成理路的一致认同上,即消解掉理解的真理与

解释的方法二者的外在隔膜而将其凝练成意义自足的日用伦常,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朱熹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能够得以互解。

在评述朱熹解读经典即读书方法时,安乐哲明确说道“朱熹似乎不鼓励对文本的自由解读,不过他同时强调读者必须努力让文本成为自己的。”^[2]这里就存在一个经典诠释时个别人的理解和解释与经典本来意义的契合度和距离的关系问题。与此相类,冯友兰先生在论述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文本解读的自由度时,曾经这样说“历史有‘历史’和‘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难相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符合。”^[3]亦即个别化的人所诠释的经典与经典的真实之间永远存在一条边界不清晰的解读张力域。接下来的情景将是任何一种诠释都是一种兼有普遍性和个别性的效果历史。如冯先生所说“若究竟无人能定,则所谓写的历史与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4]但如果是以思想史的新意填充了由于不完全解读所导致的价值缺失,反而可以还原经典的完满性。但这样一种传统主义哲学诠释方法在朱熹这里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运用,这在思想史上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

在评述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时,伽达默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张新国(1984-),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政治哲学、宋明理学。

尔说道“这其实是一种特别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在这里再次致力于传统真理并试图更新传统,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的态度。”^[5]朱熹作为经典诠释方法的传统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义和使用的。所以卜道成直接地说“在中国持续了七百年之久的伦理和形上学系统,即新儒学,与其说是孔子学说,倒不如说是朱熹之学。”^[6]这种学理形象的表露正是由于朱熹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的效验使然。

二、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诠释方法阐微

方东美在谈到朱熹哲学的历史前提时说“我将朱熹哲学的体系描述为一种整合,不仅是因为他受到其前辈的极大影响,也是因为他从其前辈那里借用的范畴缺乏连贯性。”^[7]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朱熹哲学体系“受到其前辈的极大影响”,一是朱熹哲学“从其前辈那里借用的范畴缺乏连贯性”。前者可径直理解为体现在朱熹哲学中的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但是问题在于朱熹哲学与其前辈在释义时的义理出入也正是其传统主义经典诠释方法的另一种题中应有之义,即通过诠释超越传统,这已不是对文本的自由解读,而是跳出传统的格局更新和发展传统经典。

(一) 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诠释方法体例举要

传统主义作为一种经典诠释方法,容易被单向度地理解为保守主义,即片面地追求恢复古代某个特定时期的学理和现实。朱熹的传统主义诠释方法固然有这一层意思在,但如果仅作此理解,将有失公允且独断。其更深一层的意涵,同时也是其最主要的意涵在于通过易于为同道所理解的概念范畴来阐发思想史新的意义。

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经典诠释方法在其对读书解经方法的体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约略可以将朱熹解经方法分为理解的三个阶段,即刚刚接触经典之时、有所领悟之时和内化创新之时。在概括“读书之正法”时,朱熹对于刚刚接触经典之时的状况谈到“读书有个法,只是刷刮净了那心去看……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8]从此可见,朱熹解经方法受到了佛学因物见性和道家因任自然的思想,但这并不妨碍其诠释经典方法的普遍

适用性。即告诫初学经典者不要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对经典文本作独断理解,而要最大限度地去吸纳文本中作为思想的他者的营养。到了对经典有所领悟的第二个阶段,朱熹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所得尔。”^[9]经典读得熟了,原本生硬的话语慢慢在语境当中得以理解,此时的理解约略可以称得上是经典的原始意思,但已经是经过具体理解的人思维模式和知识储备格局的加工了。读者试图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经典的文本意思,但效果往往是另外一种状况。到了经典解读的第三个阶段,朱熹谈到“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不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求自家身上推究。”^[10]这里需要留意两层意在,一是“不只专就纸上求理义”而研读经典语境整体中的深层逻辑义理;一是经由“反求自家身上推究”而提炼出来的经典的新意。只有做到这一番功夫,对于经典的哲学诠释才能够得以在其真实意义上被保存和发展。朱熹在诠释《大学》的宗旨时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己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1]此时,传统主义作为其诠释经典的方法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朱熹用来作文本教化的思想前提和直观视界。

究其实,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实质可以用伽达默尔的“教化”(Bildung)^[12]思想加以澄清。这一“教化”的实质正是在于追求哲学经典文本与个别化读者在核心理念上达成共识,并通过读经典的具体的人加以扩充、延展,从而完成思想史自身的重构和优化。

(二) 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诠释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

希尔斯在论述启蒙运动中传统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时说“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待传统应该相当慎重,传统不应仅仅被当作是障碍或不可避免的状况。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13]这样的一种态度不仅仅作为一种实践智慧而有意义,其深层的形而上学依据应该给予足够深刻的理解,即“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

本身的一个要素。”^[14]这是我们思考传统主义的前提。

作为一种哲学经典诠释方法,朱熹的传统主义首先立足于宏观的思想史叙述模式,即自觉地认识到自身学说的主体性和相对性。这样的论述方法的优异之处在于不失却哲学史的整体学理架构,而只把自身学术生命当做思想史本身流变的一个可选择性阶段,从而促成文明进程的向前推进;其失当之处则在于为了保全在传统主义监护下的哲学思想的纯粹性,用以表述传统主义的概念不得不充满主观性和分析论证逻辑的缺失。儒学如此,朱熹理学以此被诟病更是首当其冲。受朱熹理学和西方分析哲学双重影响的冯友兰直接指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和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15]这一点固然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只是我们若在吸取他学长处的时候不加甄别,则会有另一维度的偏颇。体现在朱熹理学中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法是传统主义的,这使得哲学家更多地关注自身作为思想史的主体的可能性,而没有在方法上给予思想的异见以形而下的明晰性分析和结构。文特尔班在论述古代希腊哲学思想史的阶段时将其分为“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体系化时期”^[16]。我们有理由将朱熹哲学所处的思想史时期与之进行适当的合理类比,则朱熹哲学在传统主义经典诠释方法的解读下,可以被归结为第二个时期,即“人类学时期”。只是这一人类学时期被朱熹赋予了过多的纵深演绎,即没有像西方哲学家一样在思想上及时地由第二个阶段跃迁到第三个阶段即体系化时期。从而流于在思想的原地留意过多而使得哲学史的思考半径没有相应随之伸长。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希冀能在不变的“一”中一劳永逸地直观到所有的变化的“多”,这正在于传统主义作为经典诠释的唯一方法而可以传统中包含的同一性应该和能够统摄思想史演进的不同可能性,而西方哲学约略与此相反。如朱熹说道“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诚使是说著明于天下,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17]这样一种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哲学的思辨和叙述方式。

在评述殷海光和徐复观政治哲学的基调时,谢晓东使用了“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新传统主义”三个哲学概念。其中,对于传统主义,谢晓东这样定义:“所谓传统主义,是指认同传统、言行以传统为依归、自觉地捍卫传统的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18]谢晓东的言下之意是传统主义,尤其是在儒学内部已经作为一种诠释经典的思想方法被成熟地运用,只是此时的传统主义在面临西方哲学的挑战时,在具体操作上已经开始转向整体直观与局部分析的兼顾。

三、朱熹理学视域中传统主义、启蒙、现代性及其关系引论

在评述激进浪漫主义的得失时,伽达默尔谈到“无论如何,保存与破坏和更新的行为一样,是一种自由的行动。这就是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以及浪漫主义对传统的平反为什么都落后于它们的真正历史存在的原因。”^[19]伽达默尔的意思即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都未能充分实现其最初预设的目标,原因都在于没有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搞清楚传统主义、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真实关系。最重要的是没有搞清楚理性的全部内容需要辩证地在传统主义旗帜下得以阐明。

传统主义应该被看作一种终极目的性和正当性。在论述古典的功利主义、公平和仁爱时,罗尔斯说“一旦正当和正义原则被确立,它们就可以像在别的理论中一样用来确定道德理性。”^[20]在启蒙和现代性的视域中,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经典诠释方法应该被当作这样一种“正当和正义原则”,而不仅仅像以往一样被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形而下的方法论套路。更不应盲目效仿西方国家阶段性的启蒙模式,而反过来人云亦云地抵制本土传统。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理路。这种传统主义需要被重视和明晰化,当作一种指导现代性塑造的宗教。韦伯曾谈及“某些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研究的即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苦行新教的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联。”^[21]具体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我们可以对诸如朱熹传统主义的哲学经典诠释方法作

“文化的解释”和“制度的解释”,但切不可“把儒学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当作巨大危险而抵制”^[22],而应该立足于朱熹传统主义的文化基点上,吸取西方世界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双重偏颇,“通过现代化的自我批判以及要求扬弃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23]。这是新儒家的时代使命。

在评述孟子对儒家信念的辩护时,史华兹说:“这是一个完全沉浸在儒家传统之中的人,他对于来自门外的挑战保持着深刻的警惕,尽管他也深受时代的话语的强烈影响,但在信念方面却没有丝毫的动摇。”^[24]朱熹的传统主义以其诠释哲学经典的形式呈现,作为一种推动思想史发展和塑造启蒙和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已经在性质上超越了孟子对于儒家信念维护的层面,而自觉生成一种更具解释的普遍性的创造性转化型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应该被更加相对独立地得以阐发。

(参 考 文 献)

- [1]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译者序言,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 [2] [美]安乐哲著《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M]. 温海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 [3]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页。
- [4] 同上书,同上页。
- [5]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译者序言,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2页。
- [6] [英]卜道成著《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M]. 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 [7] 方东美著《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M]. 匡钊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 [8] [宋]朱熹著《朱子语类》卷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181页。
- [9] 同上书,第166页。
- [10] 同上书,第181页。
-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 [12]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译者序言,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32页。
- [13] [美]爱德华·希尔斯著《论传统》[M]. 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355页。
- [14]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译者序言,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3页。
- [15]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页。
- [16] [德]文特尔班著《古代哲学史》[M]. 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5页。
- [17] 《朱文公文集》[M]. 卷七十五《宋张仲隆序》。
- [18] 谢晓东著《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 [19]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译者序言,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3页。
- [20] [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 [21]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 见《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 [22] 陈来著《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 [23] 杨国荣著《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
- [24]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责任编辑:黄效融)